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JOESS

比较

经济社会体制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10 年 第 2 期
总第 148 期

黄奇帆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郭鸿懋 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三十年的梳理与思考

H.V. 萨维奇 保罗·坎特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战略

罗伯特·W. 福格尔 204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彼得·拉特兰 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的发展模式的变化

贾根良 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

尼古拉斯·巴尔 彼得·戴尔蒙德 再论养老金制度改革

刘军强 中国如何实现全民医保?

刘春兴 林震 等 美国应对生物入侵立法的历史及其启示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http://www.bijiao.net.cn>
E-mail: bijiao2008@126.com

ISSN 1003-3947



主管：中央编译局

编辑出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电话：(010)66509504/402/422/518

主办：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地址：100032 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零售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邮购组

邮发代号：82-732

京西工商广字0076

ISSN 1003-3947 CN 11-1591/F

定价：16.00元

稿 约

本刊一如既往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赐稿。根据期刊权威评估机构指标规定,特请来稿注意以下事项:

1. 内文篇幅一般不超过8000字。来稿务必请附200字以内中、英文提要,并列出3—5个中、英文主题关键词。

2. 译文务请附上原文,并注明出处、作者简历和是否得到中文翻译授权。

3. 为避免一稿多投,来稿请注明“专投”,如在三个月内被其他刊物采用,务请通知本刊。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因来稿量大,本刊暂不接受电子邮件和传真投稿。本刊有采用意向后,将会通知作者发送电子邮件。

4. 请作者在文末注明:姓名、职称/职务、供职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地址。

5. 本刊采用参考文献注释法。正文中,引证方式为“(作者,出版年)”,如(马克思,1995)或“(作者,出版年:页码)”,如(马克思,1995:21—22);文末附引用的参考文献。行文中需要说明的问题用当页脚注法,脚注编号以本页为限。参考文献按作者名字拼音排序,同一作者在同一年发表多篇文章或多部著作,用“出版年a、b、c”表示;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要注明所在卷次、页码。例证如下:

中文:

马克思,1995a:“《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b:“工资、价格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沙菲克,2004:“进化模式将是胜利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6:1—11。

译文:

[英]亚历山大·罗森伯格,2000:“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如何”,见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E.K.亨特,2007:《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外文: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mbetta, D., ed., 1988. Trust. Oxford: Blackwell.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002—37.

Sabel, Charlels F., 1988. “The Re-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Paul Hirst and Jonathan Zeitlin, eds. *Reversing Industrial Decline*. Oxford: Berg.

6. 参考文献按先中文,后译文、外文排序,中文和译文(译著)以中文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外文以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经本刊发表的文章其版权均属本刊专有。凡向本刊投稿者皆被认定遵守上述约定。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主管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主办单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名誉主编：吴敬琏 荣敬本 赵人伟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蔡晓莉	迟福林	崔之元	范恒山	方福前	高尚全	顾锦屏
郭励弘	郭树清	洪银兴	侯云春	胡鞍钢	黄范章	黄海洲
贾康	赖海榕	李剑阁	李晓西	林毅夫	刘成相	楼继伟
陆学艺	吕炜	吕晓波	逢锦聚	钱颖一	荣敬本	史晋川
吴敬琏	吴晓灵	谢平	信春鹰	许成钢	杨雪冬	易纲
俞可平	袁纯清	张昕竹	张卓元	赵人伟	周茂荣	周其仁
周叔莲	周小川	朱涛	邹农俭			

理事长：马建堂

副理事长：苏波 张楠

秘书长：张楠(兼)

副秘书长：成欣欣 张志越 丁开杰

理事会成员：徐尚武 叶列理 刘谦 刘希模 李跃平

吴国迪 张炳华 胡鼎柱 黎德成 王曙平

社长：何增科

主编：杨雪冬

副主编：丁开杰

编辑部主任：刘英

编辑部副主任：刘承礼

本期执行编辑：郜继红

编辑部成员：刘英 刘承礼 王燕燕 郜继红

比较开眼界 比较长知识 比较启智慧 比较出真理

编辑手记

每年的3月,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代表和委员们,相聚首都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两会”。今年的“两会”格外引人关注,“民生”、“民富”、“政治体制改革”,“城乡同票同权”、“农民工”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走过经济最困难的2009年,201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令人期待。

2008年,中国大陆曾流行过一本名叫《世界是平的》的书,后来,市场上还出现过《世界是圆的》一类的论著。撇开它们的具体内容不谈,这些书的畅销都表明全球化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与此异曲同工,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世界是可以重组”的新颖观点。在黄奇帆的同名文章中,他不仅从哲理的高度解释了为什么要进行重组,介绍了重组的方法,还紧密结合重庆市的实践论证了“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观点。可以说,在重组的思维方式指导下,重庆市的实践彰显了“危中寻机”的开拓精神。

长期以来,由于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限制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造成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期组织了“城市与区域经济”栏目,对此进行研讨。郭鸿懋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探索进行了回顾分析,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已经进入“深入发展与创新阶段”,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也仍然存在一系列困惑,比如城市经济问题缘何而生,城市经济学应当如何研究政府作用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回答。陆军对京津冀的城镇集群发展和空间结构运动进行案例分析,论证了中国城镇集群的空间演化逻辑及制度保障体系,而H. V. 萨维奇和保罗·坎特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了城市政府可能的发展议程,提出存在“缓慢或理性增长战略”、“对社区发展的关注”、“区域化”、“制定国家城市政策”等四种路径。谢训华等人对山西省左权县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实践进行总结,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绿色发展”图景。这些文章对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很有启迪。

在人类发展史上,大国崛起留下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作为大国的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必要在比较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始终坚持之。在“国别比较”栏目的文章中,罗伯特·W. 福格尔对201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作了预测,认为欧盟的经济增长从现在起一直可以持续到2040年,但其增长势头也不能与南亚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浪潮比拟。其中,中国2040年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与福格尔往前看的视角相反,贾根良则进行了回溯,他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概述了19世纪作为美国经济意识形态的“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认为特定的经济意识形态对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具有重大影响。陆南泉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选择论述的若干问题都比较重要,比如“俄罗斯缘何选择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方法”、“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另外两篇译文则分别对俄中、日中进行了比较,落脚点都主要围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当前的中国民生问题突出。无疑,只有实现大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发展才是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而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本期“社会保障体制”栏目中,尼古拉斯·巴尔和彼得·戴尔蒙德对他们过去的一些研究的总结和深化,不仅提出了进行养老金制度分析的原则,并且指出了已有的一些分析错误,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而李姿姿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经验进行了总结。另外三篇文章则分别从养老金的名义账户制、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的角度展开讨论,同样对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提出建议。

此外,本期杂志还组织了“规制理论与实践”、“比较论坛”、“文献与会议综述”等栏目。作者们对中国的产业规制(比如电信规制)、征信管理、企业收入分配、对外直接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不乏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比较开眼界 比较长知识 比较启智慧 比较出真理

目 录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黄奇帆(1)

· 城市与区域经济 ·

作为空间经济学分支的城市经济学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三十年的梳理与思考 郭鸿懋(5)

中国城镇集群的空间演化逻辑与制度保障体系 陆 军(15)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战略

——跨国比较研究 H. V. 萨维奇 保罗·坎特(23)

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二次”改革

——山西省左权县发展生态庄园经济的实践总结 谢训华等(33)

· 国别比较 ·

2040 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兼对中国和印度预测的解释 罗伯特·W. 福格尔(38)

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 贾根良(44)

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 陆南泉(50)

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的发展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 彼得·拉特兰(60)

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中日经验比较 马克·比森(69)

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 许共城(77)

· 社会保障体制 ·

再论养老金制度改革

- 分析原则、分析错误及其政策意义 尼古拉斯·巴尔 彼得·戴尔蒙德(84)
- 名义账户制与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路径选择和挑战 郑 伟 袁新钊(96)
-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李姿姿(108)
- 中国如何实现全民医保?
-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刘军强(115)
- 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 基于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历史考察 张士斌(123)

· 规制理论与实践 ·

- 规制经济研究中的政策偏好与现实反差 白让让(131)
- 我国征信管理从“划桨”转向“掌舵”,抑或两者兼之?
- 兼议《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曹军新(138)
- 中国转型的微观机理研究:基于地方政府规制企业的视角 曲 亮 刘 铎(144)
- 电信规制改革的国际比较 刘 轩(155)
- 美国应对生物入侵立法的历史及其启示 刘春兴 林 震 温俊宝 骆有庆(161)

· 比较论坛 ·

- 企业战略关系研究:基于博弈论的理性思考 汪长江(167)
- 美、日汽车工业技术联盟比较与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 郑晓奋(171)
- 企业收入分配的“四位一体”公式:一种企业产权依据 李全伦(176)
-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民营企业国际化模式转型
- 基于温州企业的分析 何守超(184)

· 文献与会议综述 ·

-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区位的国外研究述评 黄保东(189)
- 转型经济学行将消失、暂时存在还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 转型经济研究新进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白千文(195)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黄奇帆

内容提要:如何摆脱金融危机困境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可以通过重组来抓住机遇,找到摆脱金融危机困境的出路。重组的方法包括边界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利益分配、机制变革、管理和措施调整等。文章还分析介绍了重庆市通过重组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世界 金融危机 重组 重庆

一、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重组?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地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阶段,更要多依赖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重组实际上就是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无非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重组就是改变条件,条件改变了,事物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条件的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重组。其实,改革和创新就是对条件的改变,因此它们也可以被视为重组。

作为管理者、企业家、或者政府官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重组呢?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点原因:第一是为了获得超常规发展。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性机会,实现超常规发展。第二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某些问题或许由来已久,传统的方法不能解决、堆积至今,那就可以考虑运用重组的思维。第三是为了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某些问题广泛存在于各个企业、各个地区或者各个国家,对于这类普遍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通过重组加以解决。第四是为了摆脱困境和危机。不论是经济危机、企业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有时候就需要通过特殊手段予以摆脱,这就需要重组。第五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条件下,想要取得新的突破,保持竞争力,就需要用改革和创新的思维,也就是需要用涉及重组的思维去想问题。

二、有哪些重组的方法?

谈到重组的方法,基本上有以下五种。

第一,边界调整法。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的,调整边界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换。比如,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余人员多、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等问题,一家企业可能有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负

作者简介:黄奇帆,重庆市市长。

本文是作者2010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由作者授权在本刊登载。

担,这样企业的经理肯定不好当。朱镕基总理在1990年代推行的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边界条件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债务剥离等,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国企边界条件调整后,许多优秀企业家才能脱颖而出。近十年国有企业的伟大成就,应该就是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调整国企生存边界条件以后产生的效果。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法。即在市场原则下,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利用率,取得更大收益。很多企业间的强强合作、或者强弱兼并,都是调整资源配置的结果。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地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新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调整后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对内部机制体制优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上市、社会或者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和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工作要求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规范高效运作。

三、重组需要把握哪些原则?

在实际的重组过程中,还需要把握一些至关重要的原则。

第一是选择恰当的时机。重组需要外界条件的支持,而外界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需要选择正确的时机。否则,重组机会稍纵即逝,不仅导致成本大大提高,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二是选择恰当的合作对象。重组不是群众运动,它涉及权利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是有实力有资源的对象之间的合作,合作对象的选择关系到重组的成败。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伙伴,重组中都需要默契的合作,推进重组的顺利进行。

第三是坚持多赢的原则。重组会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实施过程则应该利益均分,实现共赢。如某一原股东退出,债务人不能过分赖帐、债权人要适当让步、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各主体之间应坚持共同协商,必要时共同妥协,各退一步,然后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利益多赢。

第四是要依法,依市场规则,依公平正义原则办事。重组涉及利益调整,绝不能搞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的事。

第五是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防止出现解决一个危机却引发了一个更大的危机。

四、危机背景下,重组如何助推重庆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拯救各种金融企业,这些都涉及重组。中国国内的社会改革、企业改革、经济改革也和重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和重组有关的案例,也是和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有关的一件事。

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即“危中有机”,危机中往往产生技术革命,会带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成果,这种技术革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现在大家说金融危机中的技术成果,大多讲到低碳经济,讲到新能源等等,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新技术是信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由于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比20年前的巨型机还多,这是集成电路发展

产生的效果。面板显示屏替代彩管波壳这样的显示系统,使得台式 PC 机都可以变成薄型的笔记本电脑;同时,基于无线上网技术的普及运用,电脑上网可以像手机一样使用,而不再需要拖着尾巴用光纤电缆。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冲击的产业较多。但是对于笔记本电脑市场,其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年均增长 30%。据预测,2012 年,世界笔记本电脑市场将会达到 3 亿台以上,相对于 2008 年的市场将增加 1.5 亿台左右。这是世界电脑巨头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政府顺应“台式 PC 笔记本化,笔记本手机化”的潮流,当机立断,迅速行动,较好地抓住了危机中的发展机遇。2009 年,重庆市成功引进了惠普 3600 万台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是把原有的在沿海分布的 1.6 亿台转移到重庆来,而是新增的 1.5 亿台的一个部分。

惠普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最重要的企业,在现有的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中,它约占 30%,在新增的 1.5 亿台市场份额中,它当然想再囊括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此,惠普决定在重庆搞个 3600 万台的笔记本电脑基地,他们自己只负责设计销售,把生产制造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这些企业到了重庆当然也不会只为惠普一家代工,他们也为其他的电脑品牌代工,这样一拖三,三拖六,最终在重庆将形成 8000 万台的产能。重庆能够成功引进该项目,具有五个积极的意义:

一是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调整了产业结构。在未来三四年,重庆能够成功实现再造一个现有工业的梦想。2008 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约为 8 千亿元人民币,而在惠普、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等企业零部件加整机全面投产后,将会产生 7 千多亿的销售值,再加上打印机等配套就会带来 8 千多亿的产值,几乎再造了一个重庆工业。推动信息产业占比超过 35%,有效提高了轻工业、电子工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比重,调整了重庆原有“傻大黑粗”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是西部一般比较闭塞,产业外向度不够。整个中国大陆每年 25000 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中西部地区只占很小的一块,重庆在 2008 年进出口总额仅为 100 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个项目完成后进出口额就是 1 千亿美元,会使重庆成为西部的开放高地。

三是产业带动力大,不仅是工业发展,还会带来航空物流、铁路公路运输、贸易结算、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是调整了重庆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这个项目将吸纳 40 万人就业,主要是信息技术背景的大学生和蓝领工人。重庆大专院校,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可能培训人员的结构都要调整。

五是缩小了东部和西部之间信息产业的差距,2008 年 1.6 亿台笔记本电脑,中国大陆地区生产 1 亿台,基本分布在沿海,东南亚和印度生产五六千万台,未来新增的 8000 万台分布在重庆,重庆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基地。

为什么惠普项目就可以产生如此积极的效果?归根到底是重组的效果。重组的思维方式、重组的模式吸引了跨国公司入驻重庆。

第一,重庆这个项目,既不是简单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也不是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产业转移。而是在危机中,用重组的思维把握住了深化改革的机遇,用重组的手法有效调整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全球格局。重组化危为机,帮助重庆受益。

第二,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油价、物价、运价飞涨,世界变得不再平了,跨国企业竭力寻求何处加工才能降低成本。相对于沿海,重庆的物流成本是一种劣势。重庆与沿海距离 2000 公

里,来回4000公里,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的加工贸易模式,不管重庆的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税收政策多么优惠,高昂的物流成本还是一个制约。所以,应该采用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方式,一方面,通过整机销售企业带动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进入,或者零部件生产企业延伸生产整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地物流产业,这样便形成了协同效应,强化了地区的竞争优势。

第三,该项目重组了加工贸易的价值链。现阶段,中国净出口2.5万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约1.2万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过程中的设计、销售、物流和金融结算几乎都不在中国,我们只是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通过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赚取加工费。事实上,每一年结算中心流失的财富要比加工贸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在引进项目时,重庆市考虑到这一点,就申请设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历时三个月的讨论,重庆结算中心于2009年9月份成立,10月份正式运转,使跨国公司在整个亚太地区的1千亿美元结算额逐步放到重庆,从而引导中国大规模加工贸易结算价值财富的回归。

五、重组延伸了产业链,加强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互动

加工贸易结算中心的设立,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是结税。结算税收,包含印花税、交易税、版税等。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一个月有几千万美元、一年就有几亿美元的税收结算,本来这个是在国外结算,流失掉的财富,现在到重庆来了,回归国内。二是结汇。几百亿美元的一个账户,一年进进出出,对于银行来说,哪一家机构拥有这个账户,一年就多几十亿元的中间收入。第三是结人。几千个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年薪几十万,这样的高级白领分布在香港、新加坡的写字楼里,而在国内就比较少。结算中心的设立,有利于这方面优秀人才的引入,进而提升人才队伍的水平。结税,引导价值财富的重新分配;结汇,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的发展;结人,引导精英人才队伍的建设。从某种角度讲,跨国公司结算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金融中心。结算中心的成立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促进重庆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打造。

重庆为什么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呢?这就需要回到前面提到的有关重组的观点:一是重组需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需要当机立断;二是重组是有实力有资源的人的一个有效组合;三是重组讲究级别对称,在一定层面上,重组不是参谋长的测算,而是领导者的决断。惠普这个项目是垂直整合的典型案列。既有边界的调整,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多种方法综合使用,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重庆开创了两大先河。第一是中央支持重庆搞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国家给予的这个边界条件,有力地帮助了项目的成功。第二是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重庆境内企业法人开设离岸金融账户。

离岸金融结算是一种改革创新,加工贸易不同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数量巨大,应该是像新加坡、香港那样打包结算。我们需要做好的是监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而实现在降低繁琐程序和流程的同时,规避骗汇逃汇的行为。概而言之,边界条件改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趋势就会发生变化。重庆和惠普的这个案列说明,整个世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价值链的结构调整,整个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调整都进行了重组。

(责任编辑:丁开杰)

· 城市与区域经济 ·

作为空间经济学分支的城市经济学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三十年的梳理与思考

郭鸿懋

内容提要:中国的城市经济学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一门新学科。三十年来,它经历了引进与摸索、发展与创新两个阶段,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问题导向和集聚导向两个学派。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城市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其理论体系设计由四个部分组成。在研究方法上,应推广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模式。

关键词:学科性质 学科研究对象 学科理论体系 学科研究方法

一、三十年的探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驶入城市经济研究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城市经济问题研究论文每年不下数百篇,有关城市经济问题的专著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则开启了创立与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十年来至少已出版了近三十部的专著和教材。从我见到的其中二十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研究城市经济学的轨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引进与创立和创新与发展两个阶段。

(一) 引进与创新阶段

大体上集中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国人对商品、市场经济认识逐步深化,城市的作用日益显著,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加速,适应这一形势要求,西方的城市经济学著作开始引进,最先引进的主要是:英国学者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1976年出版,中译本1984年);美国学者沃纳·赫希的《城市经济学》(1984年出版,中译本1987年5月);日本学者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1977年出版,中译本1991年5月);美国学者埃德温·S. 米尔斯的《城市经济学》1—4版(无中译本)以及英国学者伊文思的《城市经济学》(1985年出版,中译本1990年6月)。这些著作在1980、1990年代普遍成为国内几所先期开设城市经济学本科生和硕士生课程院校的主要参考教材,它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西方城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进而,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教材的基础上开始编写大学教材和普及读物,于是在1980、1990年代形成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立阶段。这一阶段中,最早的一本城市经济学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杨重光、鄢淦五、刘增录、魏炳坤、饶

作者简介:郭鸿懋,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和蔡孝箴教授讨论多次,深受启迪与教益,谨表谢忱,当然,文责自负。

会林、过杰几位学者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入门》(1985年版)。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曾有过杰主编的内部发行本,名为《城市经济学讲座》(1984年版)。之后,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出版高潮,这就是杜闻贞的《城市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版)、朱林兴的《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过杰的《城市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杨重光和刘维新等人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蔡孝箴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其中,还有一些专门介绍西方城市经济学的书籍,如朱慕唐、张海宁、王伯言的《西方城市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这批早期的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为创立阶段的产物,这些著作一开始就借鉴巴顿阐述的“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去解决城市的各种重大问题”这一观点,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内部发展的主要问题,诸如土地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以及城市政府管理问题展开了研究,开始把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实体(卓炯,1987),研究城市在城市分工基础上的发展史和商品经济发展下的城市种种经济问题,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

第二,这些早期著作普遍把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任务界定为城市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有几本著作明确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城市经济活动的规律。指出“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发展过程。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城市经济的活动规律、本质特征和城市内部社会经济关系,并指明它的趋势。”“分析城市经济运动的本质联系”,“揭示城市化过程的经济规律”,“是以一定生产关系下城市经济的运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究竟城市经济运动规律是指什么?认识上还比较笼统和模糊。这从各种版本的内容上可窥一斑。虽然这反映了学者们的使命感,但在表述上仍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痕迹。

第三,对这们新兴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范围内容理解不同。这从创立之日始就有较大的分歧。当然,就讨论而言是开了一个好头。首先对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看法就不同。有的研究把生产关系作为落脚点之一,认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揭示城市经济的产生、发展,最后达到城乡融合的整合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体现在其中的生产关系。”有的主张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上,“揭示城市和城市经济产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有的则主张“城市经济学所研究的很多问题是属于或者基本上属于生产力范畴的”。

再如,由于研究对象界定得比较笼统(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在学科范围和内容上就大相径庭。有的强调研究城市经济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范围较广泛,除城市产生与城市化、城市内部诸问题之外,还包括了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效益、城市经济管理、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经济改革等。有的著作强调城市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方面的,而且是从空间经济角度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化运行和城市作为空间经济载体而产生的城市问题,诸如土地问题、住宅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政府行为。

还有,这门学科是应用科学还是理论科学,看法也不同,不少著作沿袭美国赫兹和波兰鲁格尔斯基的观点,把它直接界定为一门应用经济学科,有的学者则认为城市经济学不是部门经济学,不是应用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和空间经济理论以及其他经济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的经济理论。它的性质基本上属于理论学科的范围。确切地说,它不是一般的基础理论而是应用学科的基础理论”,“是专业基础理论”。

以上几点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处于摸索阶段,对学科基本问题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但是,热烈的讨论的确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 深入发展与创新阶段

1990年代后半段至今,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及经济继续腾飞的时期,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九二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快。这一背景推动了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继续跟踪国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引进并翻译了美国学者米尔斯主编的《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手册》第2卷《城市经济学》(中译本2003年9月,经济科学出版社)、英国学者保罗·切米尔和美国学者埃德温·S. 米尔斯主编的第3卷《应用城市经济学》、美国学者阿瑟·奥沙利文的《城市经济学》(2000年第4版,中译本2003年1月,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六版,中译本2008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关注空间经济理论研究并有突破性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1990,中译本2001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1995,中译本2000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福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 维纳布尔斯的《空间经济学》(1999,中译本200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这些著作都大大推进了西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诸如论证了应用于城市经济研究的主要经济学原理;构建了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框架;突出的是克鲁格曼所完成的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波空间经济理论的研究,把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学科作为空间经济学第一次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范畴,这在城市经济学学科属性的研究方面,是一种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

在上述历史背景和国际研究前沿的推动下,这一阶段的中国城市经济研究又产生了一大批新成果,诸如谢文蕙、邓卫的《城市经济学》(1996年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2版),蔡孝箴的《城市经济学(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饶会林的《城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丁健的《现代城市经济》(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冯云廷的《城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008年第2版)、周伟林、严冀等的《城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饶会林的《现代城市经济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王雅莉的《城市经济学》(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等。

这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对城市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方法均有相当深入的讨论,我归纳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初步形成了两种不同学派,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发展与创新阶段。

作为发展,我是指: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普遍地与政治经济区分开来,不再强调研究对象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蔡孝箴教授提出城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力问题这一观点之说,又进一步提出城市经济学所阐明的城市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因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等不同而有不同”(蔡孝箴,1998)。饶会林教授也明确表示:“城市化规律、城市经济规律属于生产力范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基本相同的城市化规律、城市经济规律,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性,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不能回避或‘跳过’,……”(饶会林,1998)这一时期的著作,自然淡化了对社会制度的分

析,所有的城市经济学著作都不再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能小看,因为这是对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认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突破。

继之,不少学者把城市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这是在梳理了历经90年的西方空间经济研究史,特别是20世纪末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后对这门学科性质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中国是一大飞跃,它不仅回答了城市经济学家研究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问题,而且也明确了应从什么视角去研究城市经济,即用空间经济分析理论去解决城市产生、发展与空间布局和城市内部的种种问题,从而明确了“城市经济是‘由空间经济学家建立起来的一个公认的经济分支’”,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以城市空间要素利用为核心的城市资源配置和城市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科学”(王雅莉,2008)。这样的界定是对城市经济学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化,它从总体上框定了这门学科研究的内容,应当说是这一阶段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突破。

作为研究的发展,还体现在这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化方面。与国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相似,各种著作均重视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推进。多数著作把空间经济的区位理论、聚集经济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列为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然后以此为基础,或作为工具研究城市中各种主要问题,如城市规模、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住宅、交通、环境以及政府管理,特别是其中的城市财政与公共管理,均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展开了研究。有的著作还基于这一应用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思考。这种研究成果的确提高了对城市问题的解释力,为城市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参考。

最后,这种研究发展还体现在不少新作均重视学科方法论的研究上,提出既要重视规范研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把自196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成果引进到我国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以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推进,它有利于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真正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轨道。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说到创新,我是指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经济学界由于对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对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界定和视角,初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学派,我把它暂称之为问题导向派与集聚导向派。

问题导向派,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巴顿提出的城市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问题求解的方法”,在“目前还不可能发展出城市经济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最现实的做法是把任何系统地运用经济学原理去解决城市问题的企图,都当作城市经济学”(巴顿,1984)的见解,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扩展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建立了自己对城市经济的理解及理论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饶会林教授倾其毕生之力所完成的《城市经济学》。在这部著作中,他基于“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的中间环节,是承上启下的纽带”的中观经济的观点,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城市经济“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需要中找问题,找课题”,“要善于从分析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入手,发展其中的本质联系和规律”(饶会林,1998)。基于这一认识,在他的著作中建立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环境、城市经济效益、城市经济区域和城市经济管理等六大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把城市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现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均囊括其中^①。

^①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现代城市经济学概论》中,对城市问题又进行了重新组合,但研究思路未变。

这一学派研究的特点是对中国城市经济问题观察非常深入而且全面,力图以经济学原理包括空间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它,以寻找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注重实践中的政策建议。

集聚导向派,是以城市经济核心特征集聚经济为导向开展对城市经济的研究并建立理论体系,他们以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说明城市规模的变化,联系城市集聚经济的负外部性研究城市经济的主要问题,这派研究注重城市经济学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性质,注重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新经济地理理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除应用抽象思维方法进行归纳与演绎外,更注重规范与实证分析,特别是动态的分析,在可能的范围内引进相关的模型研究。在政府作用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财政问题。这一研究思路,在目前已出版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以周伟林、严冀等编写的教材最有代表性。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阐述城市经济学的理论部分时,首先开辟了城市集聚经济一章,以此为先导展开研究,说明集聚经济“是城市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城市规模的变化实际上是各种集聚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周伟林、严冀等,2006),提出城市厂商的区位选择理论,实质上是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而对城市体系与城市增长进行了研究。作者还联系集聚经济的重要领域,对土地的利用与研究空间结构、城市住宅经济、交通经济、物流网络、城市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扼要的分析,注重模型的引进,推动城市不同集聚经济正负效应的研究,其中还特别采用了新经济地理学说对集聚经济的重新解释。这样用集聚经济引导的研究,在其他新编的城市经济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把近十年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做上述划分未必准确,甚至也未必完全为读者所认可,但是,作为读后的一种理解,我还是看到了学界的这种可喜进展。

当前,这一学科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需要学科建设中的理论创新来解决:

第一,作为研究资源空间配置的城市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和相关应用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研究角度与内容如何区分?怎样才能使城市经济学不变成城市经济研究的“百科全书”?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与其他学科重复和“拼盘”的现象,如关于城市产生和城市化的问题,不少教材还停留在对概念的介绍和历史发展的描述上,与城市科学与发展经济学的阐述区别不大;在城市问题研究上,与产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犯罪经济学等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在分析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方面又与宏观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相仿。当然,经济学的研究从来都离不开成本效益分析和均衡分析,然而,如何把空间因素引入这种分析,是城市经济学的任务,正如沃纳·赫希所说的:“规模经济受空间集中的影响极大。没有空间集中,生产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规模进行”,是“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共同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即城市经济”(沃纳·赫希,1990)。应当说,这种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我们还仅仅是开篇。

第二,城市经济问题缘何而生?目前中外城市经济学著作中的理论体系,大都由三部分组成,即城市与城市化、城市规模、城市体系部分(有的称之为宏观城市经济学),城市内部各种问题为土地、住房、交通、环境等部分(有的称之为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政府作用(主要研究城市财政问题)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即城市问题中研究些什么?依据是什么?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其实不然。由于作者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界限过于概括,大家理解的极不相同,这当然是正常的现象。问题是这些问题缘何而生?以什么为导向展开这些问题的研究,则很少

论及。既然是城市问题,就应该不能离开城市的空间存在特征这一根源。是所有城市存在的经济问题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吗?我们到底应着重研究哪些城市问题?

第三,城市经济学应当如何研究政府作用?这是研究城市微观主体经济运行与城市宏观经济运行自然导致的研究内容。山田浩之(1991)早就提出“有必要先把城市当作一个系统来把握”,其中包括“城市间系统”和“城市内系统”,它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为实现城市内部与外部各自和相互之间的均衡,城市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与企业家等城市主体结成不经过市场的“公共经济关系”。这种政府作用的研究,在当前国内的城市经济学著作中,已有很大进展,已经从对城市政府的一般职能论述发展到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研究,有的著作以公共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集中分析了城市财政职能、财政收入与支出和财政问题及其政策选择,研究比较集中与深入。这种思路固然重要,然而城市财政归根结底是实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间、城市与区域间空间结构均衡的制度保证与政策工具,如何在城市政府作用中突出这一核心问题并与财政联系起来作分析,尚未开拓。有的著作开辟了城市区域经济一章,研究它的内涵与形成机理,城市圈内的结构、分工与资源整合,但未与城市政府行为联系起来展开研究,也是不足。如何以空间结构优化为核心研究城市政府作用,也是研究困惑之一。

二、以学科性质为基点,促使研究更上一层楼

为什么存在上述困惑?最根本的原因是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并未完全取得共识,以学科性质为基点推进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这里说的学科性质,不是有些出版物所说的: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属于应用科学、理论科学、综合科学、边缘科学等不同分类的所谓性质。这种界定和类分,严格地说不够确切也不够到位。因为任何经济学都有其理论研究部分和应用研究部分,例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等,一般地都被看作应用经济学科,但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研究。就是作为研究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的理论经济学,同样也包括不少的应用研究案例和政策结论。

本文理解的学科性质是指在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时,以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和思维逻辑来看待和分析经济发展。世界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空间与时间统一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形式,或者说是存在的本质。我们说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指一定空间区域主体的一定时间上的发展,是某年、某历史阶段世界的、中国的、美国的……经济发展。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和最小的空间所达到的一定目的(如经济增长等)研究。从学科上分,到目前不外就是两种,一种是时间经济学,一种是空间经济学。过去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前者,它的竞争性均衡分析把两个主要的空间经济因素即规模报酬和运输成本排除在外,只是一种时间分析。而空间经济学则不同,它认为经济运行是时空的结合,是以此为前提的侧重于空间的研究,是一门“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及其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的学科”(理查德·阿诺特,1996)。只把时间作为存在的形式而把空间排除在外的主流微观经济学,完全是为了便于应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因为这种竞争性均衡点与规模经济是不相容的。事实上不存在这种无规模经济的竞争均衡,正因为这一点,张伯伦提出了垄断竞争,罗宾逊夫人也几乎同时提出了不完全竞争,从而抛弃了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均衡分析,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然而,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仍然拒绝引入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概念,从而依然不能反映经济现实。空间经济学突破了这种局限,指出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一定时点的一般均衡上,而且还表现为空间上的区